

后浪出版

周策纵作品集①

周策纵 著

忆己怀人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014003195

后浪出版

C52
282

忆己怀人

周策纵著

周策纵作品集①



北航

C1688738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C52

2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策纵作品集 . 1 / 周策纵著 . ——北京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2013.7

ISBN 978-7-5100-6635-1

I . ①周… II . ①周… III .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3015 号

© 2011 商务印书馆 (香港) 有限公司

本书由商务印书馆 (香港) 有限公司授权简体版 ,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周策纵作品集 1 : 忆己怀人

著 者 : 周策纵

筹划出版 : 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 : 吴兴元

责任编辑 : 闻 静 张 鹏

营销推广 : ONEBOOK

装帧制造 : 墨白空间

出 版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 张跃明

发 行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北京通州区张家湾皇木厂 邮编 101113)

(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 010-61501799)

开 本 : 69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 14 插页 4

字 数 : 195 千

版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读者服务 : read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投稿服务 : onebook@hinabook.com 133-6631-2326

购书服务 : buy@hinabook.com 133-6657-3072

网上订购 : www.hinabook.com (后浪官网)

ISBN 978-7-5100-6635-1

定 价 : 32.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 (北京) 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1987 年周策纵教授与夫人吴南华医生摄于陌地生弃园。

▼ 周策纵教授与夫人吴南华医生一起安息于陌地生弃园附近的山林墓园 (Forest Hill Cemetery)。墓碑背面有周公生前的亲笔题诗。(王正义 [西艾] 摄影)



学术研究的新典范：论国际汉学大师周策纵

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再难一遇的汉学大师

周策纵教授（1916—2007）是我的老师，他博学深思、治学严谨。有着百科全书式的记忆与学问，分析与批评时惊人的机敏睿智，为人又好侠行义，是学者的学者，教授的教授。即使国际学术界不同行的人，对其渊博的学问、横溢的诗才、教学研究的成就，亦无不深感钦佩与敬仰。像数学大师陈省身教授与他从未见过面，也景仰他的学问与旧诗才华。^①

2007年5月7日，周教授安详辞世，享年九十一岁高寿。他的朋友与学生一致感叹，今天从中国大陆到港台，从北美到欧洲，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位像他那样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多领域治学，跨领域研究，同时又具国际视野与创新观点的汉学大师。^②而目前全球的大学教育体系，受理工典范影响的人文教育与学术研究，太注重专一的知识，像这样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恐怕再不会出现了。多年前我重返母校威斯康星大学访问，站在十八层的望海楼（Van Hise）上眺望，不禁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周策纵教授在1994年退休前，担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与历史系的双料教授，这是少之又少的学术荣誉。其教学与研究范围，广涉历史、政治、文化、艺术、哲学、语言、文字、文学等诸多领

① 吴瑞卿：《周公好诗》。见王润华、何文汇、痖弦编：《创作与回忆：周策纵教授七十五寿庆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61—62页。

② 参考《创作与回忆：周策纵教授七十五寿庆集》所收文章。

域。对我们研究文学的人来说，就觉得其中以文学成就最大，而在文学、文化、语言文字等领域，首屈一指的，要数有关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的《“五四”运动史》《红楼梦》、古典文学与理论研究及对古文字与经典的考释。几十年来，周教授以各种学术职位，利用各种场合，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积极研究与发扬中国文化。退休前，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开设中国文化史、佛学史、哲学史、“五四”研究、中国书法、《易经》、中国语言学史、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资料与方法、“五四”时期的文学等课程，另外他又在历史系研究所开设了中国历史的课程与指导历史硕士/博士论文。他以渊博精深的学识，引领中外学子跨越时空，以创新的视野，重新诠释中华学术问题。

周教授一生著述立论谨慎，所出版的著作不算多。由于他学问渊博精深、品德崇高、处事公正、好侠行义，除了自己的教学研究，还把很多时间用在评审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教授晋升著作审核等方面的学术服务上。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大学的中文系，纷纷争取他担任校外考试委员。所以我说他是“学者的学者，教授的教授”。周教授喜爱阅读，几乎无书不读，无学不问。由于坚持汉学的学术精神与方法，立论谨慎，研究要专、窄、深，往往一篇论文写了几十年，像《中文单字连写区分刍议》，于1941年提出，1954年写于哈佛大学，1968年1月发表在《南洋商报》上，而正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已是1987年。^①他探讨扶桑的那篇论文《扶桑为榕树综考》^②，据我所知，20世纪60年代我还是他的学生时，即开始写了，发表时已是1999年。这是名副其实的，使用大量原始数据，属于窄而深的专题（monograph）的典型研究。

也正因如此，许多他要写的专著或论文都没有时间写。其中有一本

① 罗慷烈主编：《教学集》（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二十周年纪念专刊），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1987，135—152页。

② 《岭南学报》第一期，1999年10月，45—118页。

大书是英文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就积极进行，他的论文《诗字古义考》(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 [Poetry])^① 就是其中的一章。《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文集中的论文也是构想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想出来的章节。^② 由于他决心用他擅长的名物训诂，繁琐的考证，深入古典文献中，以确定许多中国文学观念，可是这样就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将近九十岁时，他已不得不放弃了。

从老师已发表的中英文著述^③来分析，他的学识渊博精深，研究领域涉及范围极广，包括文学理论、诗词考评、经典新释、曹红学、古今文字学、史学、中西文化、现代化，以及政论、时论等等。除此以外，老师在其他一些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如书法、绘画、篆刻、对联、集句、回文、新诗及旧体诗词等，都有不凡的作品。我们也不能忘记，老师也是一位重要的翻译家，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失群的鸟》与《萤》，^④ 还有至今未成集出版的汇集许多西方古今诗歌的《西诗译萃》等等，都是他的代表性译著。

二、多元的学术思考与方法：

从中国训诂考据学到西方汉学传统

周策纵教授在 1948 年 5 月离开中国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博士前，已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学有渊博精深的造诣。他的学术研究可说继承了中国注重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清代朴学的考据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

① Chow Tse-tsu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 (poetry)," in Chow Tse-tsung (ed) *Wen 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8), pp. 151-210.

② 周策纵：《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

③ 参考本文第七节。

④ 二集由白先勇推荐给台北晨钟出版社，于 1971 年出版。

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① 中《说“尤”与蚩尤》与《“巫”字探源》可说是这种治学的集大成。出国后，周教授的西方汉学思想增强，突破了传统思考方式，去思考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西方传统汉学，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过去西方的汉学家，往往穷毕生精力去彻底研究一个小课题，而且是一些冷僻的、业已消失的文化历史陈迹，和现实毫不相关。因此传统的汉学研究不求速效，不问国家大事，所研究的问题没有现实性与实用性，其研究往往出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动力是纯粹的兴趣。周教授的一些著述，如《论对联与集句》^②、《〈破斧〉新诂——〈诗经〉研究之一》^③，《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中讨论龙山陶文的论文^④，就充分表现出“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的西方汉学的治学方法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精神。

周教授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与西方汉学的治学方法与精神结合成一体，跨国界的文化视野，就给中国的人文学术带来全新的诠释与世界性的意义。其英文论文“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 (poetry)”^⑤，和他所编辑的两本 *Wen 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文林：中国人文研究》）的学术研究^⑥，代表当时他自己主导的欧美汉学家的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向。

① 《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

② 《论对联与集句》，香港，友联出版社，1964。

③ 《〈破斧〉新诂——〈诗经〉研究之一》，新加坡，新社，1969。

④ 《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文化陶文考释》，《明报月刊》，1993年12月—1994年2月，136—138、92—94、108—111页。

⑤ Chow Tse-tsu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 (poetry),” in Chow Tse-tsung (ed) *Wen 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8), pp. 151-210.

⑥ 第一本由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8 年出版；第二本由香港中文大学 1989 年出版。

三、超越中西文明为典范的诠释模式：

包容各专业领域的区域研究与中国学

上述这种汉学传统在西方还在延续发展。美国学术界自“二战”以来，已开发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汉学很不同的研究路向，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叫“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它强调中国研究与现实相关，强调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这种学问一方面希望达致西方了解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了解西方。^①

中国研究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以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能单独顾及和诠释。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击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迅速发展，哈佛大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中心，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研究正式形成主流。周教授在这期间，也正好在哈佛担任研究员，^③ 他的成名作《“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

① 杜维明：《汉学、中国学与儒学》，选自《十年机缘待儒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1—33页；余英时《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及其他论文，见傅伟勋、欧阳山编：《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93，1—44页及其他相关部分。

② 杜维明：《汉学、中国学与儒学》，见《十年机缘待儒学》，1—12页。

③ 周策纵于1948年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系，1950年获硕士学位，1955年获博士学位。《“五四”运动史》，原为博士论文，在完成前，1954年，他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访问学者写论文，毕业后，1956—1960年又到哈佛任研究员，1961—1962年任荣誉研究员。

tion in Modern China)^① 的完成与改写、出版，都在哈佛的中国学的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潮中进行；他的《中文单字连写区分刍议》就写于哈佛大学。此类专著或论文，完全符合中国研究与现实相关，强调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精神。另一方面，区域研究思潮也使该书超越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同时更突破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所以《“五四”运动史》成为至今诠释“五四”最权威的著作，成为东西方知识界认识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一本入门书，也是今天所谓文化研究的典范。

《“五四”运动史》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和历史提出系统的观察和论断，奠定了作者在欧美中国研究界的大师地位。这本书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语文的档案数据，这是窄而深的史学专题、思想文化专题的典范著作。《“五四”运动史》中所搜集到的资料，为后来的学者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文学各领域奠定了基础。因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也将其出版成《“五四”运动研究资料》(*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一书。^② 另外，周教授的研究不涉及道德的判断或感情的偏向，凸显出客观史学（现实主义史学）的特质。周教授在密歇根大学念的硕士与博士都是政治学，因此社会科学（政治、社会、经济学等）建构了他的现实客观的历史观，这正是当时西方的主流史学，这点与费正清的社会科学主导的客观史学很相似。^③ 而且被奉为在中国研究中，跨越知识领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典范。另外像《新旧诗文评论集》《中英文名人小传》等文集中，甚至古典研究，如《红楼梦案》等著作，老师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

①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② Chow Tse-tsung,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③ 参考余英时：《费正清的中国研究》，见《西方汉学家论中国》，1—44页。

业研究冲击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

老师有关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观察和论断的其他论文，计划将来收集在他自编的《周策纵全集》第七册《“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及文化论集》中。

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主要从外而内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或文化思想，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只有海陶玮（James Hightower）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著述不多。这一代哈佛的西方学者，如费正清，从很创新的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观点出发，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识，又不精通古代汉语与古典文献，更无能力涉及名物训诂的问题，因此只有周教授能结合中国研究、西方汉学（Sinoology）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或朴学）去开拓中国古今人文研究的新领域，尤其语言、文字、文化、文学的新领域。

四、结合中国研究、西方汉学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

开拓中国古今人文研究的新领域

在老师的研究中，特别强调综合性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的“曹红学”研究，如代表作《红楼梦案》所展现之多元思考与方法、跨领域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比其他红学家具有更强的洞察力与创见性，使他的研究更具首创性。

“红学”这名词在 1875 年已流行使用，主要以评点、题咏、索隐为主。胡适在 1921 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校勘、训诂、考据来研究《红楼梦》，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始。而周策纵从 1950 年提出以“曹红学”来称呼他的新的《红楼梦》及其作者的研究，他继承胡适的“新红学”，加上西方汉学严格的态度与古典文献考证精神、西方社会科学多元的观点与方法，在考证、文学分析和版本校勘几个领域开拓了新天地，同时也把语言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电脑科技带进曹红学的研究。

今天的红学完全忽视咏红诗，周教授却注意到《红楼梦》读者的题咏，具有今天西方流行的读者反映批评（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的价值：“任何文学作品的评价，都不能脱离读者回应，因为评论者和文学史家本身也就是读者，都不能脱离读者的回应。题咏当然也是读者回应之一……我当然不是说，题咏可以取代红学中考证、文论、评点等主流。”^①关于《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作者是否曹雪芹与高鹗的争论，胡适及后来的学者，对清代一首旧诗中的注释“《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的“补”字肯定为“补作”（即续书），而不是修补。^②周教授始终反对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鹗的结论。他放弃不可靠的考据，先后用两种科学的方法来寻求答案。

首先，他在世界上最早采用电脑来分析小说的词汇出现频率，来鉴定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作者的异同。^③

其次，周教授又采用清代木刻印刷术来考验从文献考据出来的结论的可靠性。根据文献，程伟元从出示书稿到续书印刷出版，只花了十个月左右，根据当时可靠的刻印书作业时间，单单刻印，最快至少要六个月，其实私家印书，字模设备难全，可能更慢。这样高鹗只有四个月，如何续书二十回？《红楼梦》情节复杂，千头万绪，人物就有九百七十五个。如果曹雪芹花了一二十年才写了八十回，高鹗在四个月完成续书二十回，怎么可能？^④周教授政治学出身，社会科学治学方法与精神主导其资料分析讲究事实证据，始终严格监控着红学界望文生义的、凭臆测、空疏的解读。

周教授不但是学者，同时也是有实际创作经验的作家与艺术家，对东西方古今文学理论与作品有深入的研究。他研究《红楼梦》，以他纯文学欣赏的洞察力，常看见别人忽略的问题。譬如脂批本由于出现较早，一般红学学者就以版本的珍贵价值来决定它的文学价值较高，目前

① 《红楼梦案》，18页。

② 《胡适的新红学及其得失》，《红楼梦案》，40页。

③ 《红楼梦案》，12页。

④ 《〈红楼〉三问》，《红楼梦案》，24—30页。

大陆为广大读者出版的《红楼梦》，竟然把脂批本前八十回代替程高本的前八十回。从小说艺术欣赏与评价的角度，周教授认为程高本较好，如果这是作者的改定稿，那就不能随意忽略。只有收藏家才说手稿愈早的愈有价值。^①这是周教授的治学视野与方法：“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训诂、考证之术，近代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之理论、方法与技术，皆不妨比照实情，斟酌适可而用之。”以他的红楼梦研究为例，最能代表他的学术精神。

另外他的《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也开拓了研究古今语言文字考证的新典范、新途径。由于他对经典古籍非常熟悉，同时又精通古文字，所以他能根据实物上的古文字，参考经典误传、误读、误释之文，探索古代未显的社会生活与思想。从古文字来了解古代文学思想的，《诗字古义考》及《古巫对乐舞及诗歌发展的贡献》就是最佳的研究范例，从古文字（铭文考释）了解古代文物，如盛药酒之壶有《一对最古药酒壶之发现：河北省满城汉墓出土错金银鸟虫书铜壶铭文考释》^②。从考释陶文证实古代有赐灵龟为礼物的文化，如《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实：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龙山文化陶文考释》^③。

五、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

由于周教授与世界各地的作家有着密切来往，本身又从事文艺创作，使得他对整个世界华文文学也有独特的真知灼见。他1948年到美国后，就自认要继承“五四”的新诗传统，联合海外诗人，尤其纽约的白马社，继续创作。他所编辑的《海外新诗钞》^④就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的一章，不可被遗漏。1988年，新加坡作家协会与歌德学院主办“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东南亚华文文学”，特地请周教授

① 《〈红楼〉三问》，《红楼梦案》，30—34页。

② 《大陆杂志》62卷6、7期，1981年6月，1—12页。

③ 《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25—46页。

④ 出版时被改名《纽约楼客：白马社新诗选》，台北：汉艺，2004。

前来对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的作品与研究作观察报告。他对世界各地的作品与研究的情况，具有专业的看法。在听取了二十七篇论文的报告和讨论后，他指出，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已经产生“双重传统”（Double Tradition）的特性，同时目前我们必须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Multiple Literary Centers）的观念，这样才能认识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重要性。我后来将这个理论加以发挥，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①

我们认为，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的作者与学者，都应该对这两个观念有所认识。任何有成就的文学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现代文学也必然有它的文学传统。在中国本土，自先秦以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大文学传统。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自然不能抛弃从先秦发展下来的那个“中国文学传统”，没有这一个文学传统的根，东南亚，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不能成长。然而单靠这个根，是结不了果实的。因为海外华人多是生活在别的国家里，自有他们的土地、人民、风俗、习惯、文化和历史。这些作家，当他们把各地区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本身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土的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文学，以我的观察，都已融合了“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而发展着。我们目前如果读一本新加坡的小说集或诗集，虽然是以华文创作，但字里行间的世界观、取材，甚至文字之使用，对内行人来说，跟大陆的作品比较，是有差别的，因为它容纳了“本土文学传统”的元素。^②

当一个地区的文学建立了本土文学传统之后，这种文学便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更不能把它看作中国文学之支流。因此，周教授认为我们应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华文文学，本来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可是华人遍居海外，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与文学，自然会形成

① 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东南亚华文文学，1988年8月，见王润华等编：《东南亚华文文学》，新加坡：歌德学院与新加坡作家协会，1989，15—19页。

② 王润华等编：《东南亚华文文学》，新加坡：歌德学院与新加坡作家协会，1989，359—362页。

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目前我们已承认有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的存在。这已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承认世界上有不少的华文文学中心。我们不能再把新加坡华文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①

周教授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以身作则，尤其旧词、现代诗、书法、雕刻、绘画的艺术都有惊人的造诣，相信日后会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要认识周教授，必须认识他作为学者、艺术家、作家、翻译家等方面的成就。

六、开拓国际学术、文学事业

周教授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贡献并不限于他的个人著作。他的学术事业也一样重要，其所产生的影响是国际性的。^② 他首先以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为基地，在长达三十一年（1963—1994）的教学研究生涯中，发展以语言文学为思考角度的中国人文研究的国际学术重镇。这是故意为了与他出身的哈佛以近现代历史思想出发的研究不同。

周策纵教授在 1948 年离开中国到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博士，1954—1962 年中间，他在哈佛大学以“五四”运动为研究重点，以研究中国现代化变迁，作为回应与挑战的模式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1963 年到威大任教后，他明显地从以费正清路线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变迁，从外而内，以西方影响下的回应与挑战的模式，逐渐转向中国人文研究，尤其是语言文字与文学的领域。他结合了以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为重心的欧洲汉学与清代的考据学。他出国前，已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学有渊博精深的造诣。他的学术研究可说继承了

① 王润华：《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4，256—272 页。

② 余英时：《费正清的中国研究》，见《西方汉学家论中国》，15—17 页。

中国注重版本、目录、注释、考据的朴学传统，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周教授一开始就从中国文化一元论与西方中心论走向多元文化的思考与方法，主张在西方文化对照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西方文化建立的诠释模式不能充分解释中国文化，西方汉学与中国学从外而内的方法也有缺点，常常反溯到中国传统是必要的进程。

20 世纪 60 年代中，鉴于欧美有两百多所大专学院有中文系，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中国学者居住在欧美，使得东西文化交融，因此西方与华人学者，通过国际性创新的视野，多学科的思考与研究方法，有助于重新探讨中国文化的必要，尤其是中国的人文问题。^①所以周教授除了以个人的教学与研究，另外领导威大的学者，主编《文林》，推动西方学者的多角度多方法的中国人文研究（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促成威大成为当时西方重要的中国人及研究重镇。^②

由于周教授的教学与研究范围，广涉历史、政治、文化、艺术、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而且对古今中外的从人文、社会到自然科学都有兴趣，各种各样的学术服务，如校外考试委员、评审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著作审核等方面的学术服务，从北美、欧洲到澳洲，从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到后来开放的大陆的大学及研究机构，都积极邀请他。至于在研讨会发表论文和学术期刊的邀稿，那就更多。这是由于他好动随和，做人行侠好义，因此都会积极参与上述的活动。很多学术领域的发展，如“五四”运动、红学研究、古文字考释等等教学课程与研究，从威斯康星到欧美，到亚洲，与他的推动分不开。譬如中国文学批评国际研讨会在处女岛举行、《红楼梦》国际会议在威大与哈尔滨举行，主编《文林》，推动西方学者以多角度多方法进行中

① 在美国另一位文史精通的学者余英时也有这种抱负：“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之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4 页。

② 出版了两集，Wen 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 vol. 1 and vol. 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8, 1989).

国人文研究等等。

周教授另一项贡献是其他学者所没有的，就是鼓励与推动文学创作。他与世界各地、各个世代的作家，从欧美、中国台湾及香港地区、新加坡、大陆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积极参与美国华人的文学艺术运动。文学方面有白马社，文化方面有《海外论坛》。他认为自己与黄伯飞、卢飞白、艾山、唐德刚等1949年后留居海外的诗人肩负着继承大陆“五四”以后白话诗的传统使命，编有《海外新诗钞》^①。由于长期与世界华文作家的交流与鼓励，很多年轻作家后来都到威大教书或深造，台湾有丁爱珍、钟玲、高辛甬、何庆华、张莘、王晓薇、于念慈、盛孝玲、黄碧端、痖弦、罗智成、周昌隆、杨泽、古蒙仁、蔡振念、王万象；马来西亚/新加坡有王润华、淡莹、黄森同、蔡志礼；香港有何文汇、陈永明；大陆有陈祖言等。周教授的新诗常发表在《明报月刊》《香港文学》《新华文学》《联合副刊》《创世纪》等刊物。当他的学生、朋友预备为他出版一本“七十五寿庆集”时，他建议以文学创作为主，后来便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创作与回忆》为他祝寿，里面收集了他的学生、朋友的文学创作，也有周公的新旧诗及书画作品。

同样的，周教授也跟世界各地的诗词家与书画家有密切的关系，如新加坡的潘受，大陆的刘旦宅、戴敦邦，香港的饶宗颐，台湾的董阳之等。他对书画不止于兴趣，也有其专业性，如在1995年台北书法界要编一本民初书法，特别请周教授回来台北住了几个月，把《民初书法：走过“五四”时代》编好。收录之作品以民国初年通过“五四”时代为重心，特别是20世纪前30年已具影响的人物，目的在表现时代思想精神的源流。选择这一时代来展出，在于“五四”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极

^① 黄伯飞教授曾说：“策纵兄希望把艾山和我们其他几位的诗放在一起，作1949年以后居留海外的同好们，继承‘五四’以后白话诗的传统的一个集子。”见《创作与回忆：周策纵教授七十五寿庆集》，117页。精简版在台北出版，只收录白马社诗人的作品。周策纵、心笛编：《纽约楼客：白马社新诗选》，台北：汉艺，2004；后来心笛、王润华再扩大重编，已出版《海外新诗钞》，台北：新地文艺，2010。